

协商与调适：《夕雾花园》的跨文化实践

王臻、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陈团英的《夕雾花园》(2012)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马来亚为主要背景，讲述了日据时期曾经被关押在日本拘留营的海峡华人张云林和隐居在金马伦高原的日本园艺师中村有朋之间的故事。云林为了纪念在战争中去世的姐姐，跟随中村有朋学习日式造园技艺。二人的关系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成为师徒再到发展成亲密爱人的演变过程。当年老的云林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状况，时常头疼并且记忆力消退时，她决定提前退休离开法官席，回到曾经与中村有朋生活过的夕雾花园，开启一场“忆”与“记”的旅程。通过云林对过往生活的追忆与现实生活的反思，可以发现她对于外来的日本文化由冲突到逐渐涵化的转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自身原有的华人文化的再思考。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环境下，云林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和调适，具备跨文化实践的特征。

关键词：陈团英，夕雾花园，跨文化实践，马来西亚华人文学

* 王臻，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何启才，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Negoti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Trans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WANG Zhen, HO Kee Chy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2012), written by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Tan Twan Eng, is set mainly in Malaya during the 1940s and 1950s.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Teoh Yun Ling,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in an internment camp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a Japanese gardener, Nakamura Aritomo, who lived in seclusion in Cameron Highlands and taught her how to build a Japanese garden to commemorate her deceased sister. The story depicts their evolving relationship from initial rejection to becoming mentor and apprentice, and finally intimate lovers. As the aging Yun Ling discovers her health declining, experiencing frequent headaches and memory loss, she decides to retire early from her position as a judge and return to Yugiri, where she once lived with Nakamura Aritomo. She embarks on a journey of memorizing and remembering. Through Yun Ling's reminiscence of the past life and her reflection on the real life, it can be found that she changes her attitude towards Japanese culture from conflict to gradual acceptance, as well as the rethinking of her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ulticultural Malaysia, Yun Ling's negotiation and adaptation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cultural practice.

Keywords: Tan Twan Eng,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transcultural practic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一、前言

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陈团英祖籍中国福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返回马来西亚执业于吉隆坡知名律师事务所,后来又回到南非开普敦大学修读硕士。目前旅居开普敦,专事写作,是一位跨国作家。《夕雾花园》是一部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小说,于2012年在纽约出版,当年即入围曼布克奖决选名单,并赢得2013年度曼亚洲文学奖与惠特布莱德历史小说奖。小说主要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马来亚为背景¹,讲述了曾被关押在日军拘留营的海峡华人张云林和隐居在马来亚金马伦高原的日本皇家园林师中村有朋的故事。

张云林1923年出生于槟城华商家庭,年少时与姐姐张云红一起随父母到日本度假,遂被日式园林的美所吸引,以致回到马来亚之后仍然念念不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因父亲张文豪与时局政治的牵连,姐妹俩被日军抓到一个隐蔽的拘留营。云红被迫当慰安妇并多次堕胎,身体饱受屈辱和摧残;云林因偷取食物为姐姐补身体而被砍断小拇指。在这段极度痛苦的时期,她们唯一的慰藉就是听云红描述她曾经看过的日式花园里的所有细节,憧憬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式花园。日本投降前准备炸毁拘留营,云林被日本军官富永昇救出,姐姐和其他所有囚犯则被活埋。战争结束后,云林选择到剑桥大学修读法律,毕业返回马来亚担任法官,时常关注并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后来因批判政府的不当决策而被迫辞职,在朋友麦格纳斯的建议下,带着对姐姐离世的愧疚,来到马来亚唯一的日式花园,即夕雾花园,跟随中村有朋学习造园技艺。小说通过张云林回忆战时的遭遇以及战后的生活,揭示了她面对不同文化所进行的协商与调适,尤其是对外来的日本文化的涵化和在此过程中对自身原有的华人文化的再思考,最终走向跨文化实践。

在《夕雾花园》的作者自序中,陈团英写道:

乡愁是我们用来应付记忆的方式之一,在《夕雾花园》里,女主角张云林说:“人若没有了记忆还能是什么?只是一缕幽魂,陷入幽明两界

¹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包括马来亚日据时期(Japanese Occupation, 1941年12月—1945年8月)和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Malayan Emergency, 1948年6月—1960年7月)。日据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队于1941年12月8日凌晨骑自行车穿越热带丛林入侵马来亚,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二战投降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在这期间,英属马来群岛先后被日军占领,英国撤退。紧急状态时期是指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后,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时期,一致持续到1960年才结束。期间,共和联邦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之间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游击战,最终以马共的解散而宣告结束。海峡华人(Strait Chinese)是指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檳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及其后裔,俗称峇峇(BaBa)。早在十六世纪,马六甲就有华人社区,其中,有些华人与当地妇女结婚,子子孙孙繁衍下去,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族群。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接受英文教育,英语成为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语言。

之中, 没有身份, 没有未来, 没有过去。”(陈团英著、庄安琪译, 2015, 页 13-14)

由此可以看出, 记忆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形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云林的失忆是促使其通过回忆探寻自我身份的诱因。

目前关于《夕雾花园》的学术研究主要从叙事学、创伤理论及后殖民视角等进行分析。例如, 叙事学研究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尔森·伯纳德(2018)以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和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等视角, 分析陈团英小说《雨的礼物》的国族叙事和《夕雾花园》的身体叙事, 进而探究个人通过记忆对空间和身份的回溯性改造; 创伤理论研究方面, 施乃安(2017)以创伤及见证理论为基础, 检视作者如何呈现与诠释《雨的礼物》中的菲利普及《夕雾花园》中的张云林所经历的创伤、记忆和释怀, 并将原本单一的个人见证延伸至集体对于历史创伤的探讨; 后殖民视角下的研究则相对丰富。游明哲(2017)主要探讨小说中空间、身体及历史的废墟与废墟化过程的政治, 指出小说中已成废墟或正在废墟化过程的空间使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具备可能性。塞内卡·努尼萨·佩拉诺(2015)根据尼采的“道德谱系学”, 分析作为叙述者张云林的怨恨情感的演变过程, 即从怨恨的起源直至最终消散, 探究张云林的叙事与“道德谱系”的相关性, 提出“遗忘是一种积极的压制形式, 记忆是承诺的痛苦延续”, 并以此阐释张云林的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及与中村有朋相处时所感受到的日本美学对其个人性格及情感的影响。安吉莉亚·潘(2016)指出, 陈团英通过刻意混合和叠加各种文化特征和艺术传统, 表现了后殖民记忆见证过去与记忆审美化之间的张力关系, 构建了记忆的跨文化审美策略: 将记忆视为一种珍贵的、稀缺的艺术对象, 以对抗记忆中历史见证的政治功能。

基于以上文献的梳理, 本文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 分析张云林面对外来的日本文化以及自身原有的华人文化时所进行的协商与调适, 揭示其进行跨文化实践的复杂过程。

二、日本文化的涵化

涵化是一种文化变迁的模式, 指不同文化的个体或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童恩正, 2004)。涵化的重要手段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调适, 而且在涵化过程中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因子使自身发生改变。安吉尔·拉玛(2012)认为, 选择是文化可塑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个体或群体的能动性选择反映了一个文化社群所具有的生命力。

云林的边缘化处境，是她逐渐接受外来的日本文化并进入文化涵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她出生于槟城的海峡华人家庭，就读于修道院学校，受英文教育，父亲是亲英派，家庭语言是英语，偶尔会夹杂一些福建方言；她不会写汉字，对华人的古典文学知之甚少，家里除了农历新年，从来不过其他华人的节日，被讥笑为抱欧洲人大腿的海峡华人。日本占领马来亚后，她和姐姐被抓去拘留营，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战争结束时，作为唯一一个从拘留营逃出的囚犯，她回家后家庭的关爱是缺失的：父亲以为她早已在战争中死去，母亲也因在战争中精神受到刺激而不记得她是谁。同时，云林也缺乏与家人的沟通。她一直认为导致她和姐姐被抓去拘留营的根本原因是父亲的错误政治立场。因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曾为中国国民党搜集情报。因此，当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日军开始翻旧账，并对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华人展开疯狂的报复，最终姐姐惨死，母亲疯癫，家庭支离破碎。

正是因为与社会和家庭的疏离感，当云林大肆批判当权政府而被迫辞职后，决定听从麦格纳斯的建议，委托中村有朋为姐姐建造一座真正的日式花园，以此来表达对她的怀念，并救赎自我。因此，云林来到夕雾花园拜访中村有朋，开始接触日本文化。在涵化日本文化的过程中，云林也经历着“痛苦回忆”与“消解怨恨”的矛盾张力。

一开始，云林在日据时期的痛苦回忆，加剧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在拘留营时，她们每天吃极少的食物，下苦力挖矿坑搬运石头，稍有不慎就会被绞死。因此，当第一次与中村有朋会面谈论为云红建造日式花园时，云林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完全没有办法与他进行轻松的交谈。在中村有朋拒绝了她的请求之后，她变得极为愤怒；之后因为修缮夕雾花园人手不够，中村有朋提出收她为徒，并教她造园技艺时，她也表现出本能的拒绝，“做他的徒弟，听他使唤，这个想法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曾经发誓绝不再让任何人控制我的人生。”（陈团英著、庄安琪译，2015，页93）但这是她能够实现姐姐遗愿的唯一途径，所以她不得不答应中村有朋的提议。

在跟随中村有朋学习的过程中，云林真正感受到他谦逊的品格和精湛的园林技艺，开始尝试说服自己消解对日本人的怨恨，放下对中村有朋的成见。这是她经过自我身份协商后所做出的决定。当专注于造园技艺本身时，云林也开始了接受日本文化涵化的过程。

首先，在日式园艺方面。云林认真阅读中村有朋送给自己的最古老的日式花园选集《作庭记》，从理论上了解日式庭院设计所注重的“物哀”的美学意义，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她听从中村有朋的建议，脱下自战后从来没有脱下过的手套，用残指亲自触摸土壤和石头，按照石头之间的距离、比例和空间，进行园林的铺石设计，学习如何在光与影等自然外力的作用下，将草割成不同的高度以

形成代表阴阳组合的象征和谐的道教图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 云林领悟到日式花园讲求的崇高意境, 即摆脱繁复的风格, 创造较为简约的布局, 表现出对禅宗的深刻着迷, 最终达到空无和静寂的地步。所以, 她主动实践日本的园艺文化, 如铺石和借景技艺等, 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心的布局, 使园林成为一处庇护所。在那里, 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 只有精神永存, 以此传递佛教的禅宗之意。

其次, 在弓道文化方面。云林第一次到夕雾拜访中村有朋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他张弓射箭的形象。

这名男子举起弓, 把弓弦往后拉, 他的手臂分别朝两方拉扯, 到最后整个人仿佛漂浮在地板上似的。他拿着绷紧的弓站在那里, 脸上浮现彻底的平静, 时间仿佛停止了: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他射出了箭, 弓弦在空中划出了尖锐的声响, 一只手臂依旧伸着, 使那把被他握住的弓中心点和他的眼睛对齐。他又看了箭靶片刻, 才放下弓。(陈团英著、庄安琪译, 2015, 页 71)

云林被弓道所透出的时空停驻的静谧感所吸引, 主动提出想要学习弓道。她在中村有朋的帮助下, 换上弓道服, 认真聆听、领悟并练习弓道的每一个细节, 例如, 弓手的力量如何由地面, 经由双腿向上, 沿着臀部抵达胸膛, 进入心里, 再由手臂发力射出; 弓手的呼吸如何经由下丹田到腹部, 把每一口气都深吸入体内, 在一呼一吸中感受身体的扩张, 感受自我的存在。通过不断操练这些近乎神圣的仪式, 她的专注力不断加强, 心神更加趋于平静, 将日本弓道文化中蕴含的“运动中的静止”和“静止中的运动”的人生观内化于心。她不再因为日本人在日据时期的暴行而怨恨每一个日本人, 而是抛开心中的杂念, 专注于事物本身, 达到身心的和谐。

三、华人文化的再发现

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2001)认为, 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在艺术和学习上, 而且在制度和日常行为等方面都表达出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云林不仅从中村有朋那里了解了日本的造园艺术和弓道文化, 还将这些日本文化所蕴含的“宁静平和的心境”和“自我存在的感知”等理念融入她的日常生活中, 影响她的思想。当她被中村有朋收为徒弟的消息在金马伦高原传开后, 人们都无法理解她如何在日本人对她和她的同胞犯下残酷的罪行之后还能与日本人一起工作, 她并没有选择停止学习; 当她和中村有朋同居后, 人们将她视为异类, 可她依然正大光明地与中村有朋一起出席各种公开活动; 在中村有朋失踪后, 她被记者大肆报道战时被俘的经历以及与中村有朋的亲密关系, 父亲骂

她丢尽了家里的面子，命令她立即离开时，她也丝毫不理会。因为对于云林而言，夕雾花园是一个可以让时间停驻的静谧空间，在这里她会忘掉外部的纷乱嘈杂和内在的悲伤痛楚，感受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解脱。这种生活方式是她内心深切渴望的，因此她不愿意放弃。

尽管如此，当一种外来文化进入时，个体不仅会从外来文化中选择文化元素，而且还会从自身的原有文化中选择文化元素（安吉尔·拉玛，2012）。通过对自身原有文化进行能动性选择，重新发现其价值。云林在经历日本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自身原有华人文化的能动选择。

尽管她与家庭的关系并不亲密，但她始终坚持使用家族的姓氏，体现着她对于华人姓氏文化的认同。姓氏是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和标志和符号，更是了解华人根文化的入口。虽然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但云林强烈地认识到“张”代表着她与家族的联系，蕴含着血缘、亲缘或族属关系，是华族千百年来传统与礼制。“华人必须以家庭为先。这是我所接受的教养。我从来没有改过我的姓名，即使在英国念书时，也不曾为了方便而取过英文名字。”（陈团英著、庄安琪译，2015，页52）

除了对华人传统姓氏文化的继承，云林也坚持实践华人的丧祭习俗。“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丧祭之礼在华人社会的礼乐文明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被视为道德涵养的重要手段。死亡代表亲人的生离死别，而丧祭是生命意义的终极体现形式。因此，“入土为安、居丧尽礼、逝者祭拜”等丧祭观念和礼仪也反映在云林思想和行为上。云林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在战时被活埋的姐姐云红的埋骨之处，把她和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从被禁闭的日军拘留营矿坑中解救出来，办一个合适的丧礼，郑重地安葬他们。尽管无法找到姐姐的尸骨，但她还是特意在家乡槟城的观音寺为姐姐立了一个牌位；在麦格纳斯的葬礼上，云林以华人的礼制，用白色信封包好礼金，即“赙仪”²，送给麦格纳斯的妻子艾蜜莉，以此来表示对逝者的沉痛悼念之情；战后艾蜜莉去世，云林去祭拜麦格纳斯一家，发现了艾米莉生前为中村有朋立的汉字墓碑，她跪在墓碑前，为他们点了三炷香。另外，她也通过华人传统的点灯和放灯笼等仪式为逝者祈福，寄托思念之情。通过祭拜仪式，云林的心理得到慰藉。她不再囿于对逝者的执着，学着放手和释怀。

可以说，通过对华人姓氏和丧祭习俗文化的再发现，云林原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被触动，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调适，以开阔的视野思考自我身份的意义。她不再悲观地看待自己逐渐退化的记忆，而是决定在记忆还未彻底消失前，重新

²注：华人的丧葬礼仪又称“奠仪”，旧称白事，分为“赙仪”和“赠仪”。赙仪指在丧礼中致赠死者家属以现金财物。赠仪则多致赠以花圈、花篮、果篮、挽额、挽幅、挽幛、挽联、衣被、唁文、金银纸等物品。

投入恢复夕雾花园的工作, 并在天堂亭边设置一块纪念碑来叙述云红的一生, 让这些客观存在的“物”作为记忆的载体和文化的印记得以延续。

四、跨文化实践

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环境下, 经历了外来文化的涵化以及原有文化的再发现, 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个体, 其自身具有“跨”文化性。每一个个体都努力在异质与矛盾中寻求跨越不同文化边界, 寻求身份认同的价值。这种跨文化实践的复杂性使其自身具备较强的生命力。

首先, 在跨文化过程中, 原有的华人文化内部发生变异。在华人的传统文化记忆中, “赏圆月、吃月饼、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 圆月、月饼是华人社会对团圆与和睦的心理期许; 后裔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救世大英雄; 嫦娥是顾全大局、维护丈夫的忠贞妻子。但在马久巴茶园这个跨文化场域中, 艾蜜莉为友族孩子们讲述关于古老中国的中秋节传说: 中秋节是为了庆祝起义, 当时起义者将推翻中国元朝统治者的口号刻在饼皮上, 只有把切成小块的月饼拼起来的时候才能看到; 后裔不是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英雄, 而是遵照皇帝旨意射日, 并在皇帝驾崩后继承皇位, 热衷皇权, 遍寻仙丹以求长生不老; 嫦娥不是为了避免仙丹落入坏人之手而在情急之下吞下长生不老药的好妻子, 而是在看到后裔藏仙丹时心生好奇, 趁后裔外出时偷偷吞下丹药, 飞升成仙。由此可以看出, 艾蜜莉讲述的中秋节故事颠覆了云林记忆里的华人传统文化, 使她开始理性地思考华人传统文化内部中的嬗变因素, 逐步接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元素, 进入跨文化实践阶段。

其次, 在跨文化过程中, 自身原有的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碰撞, 经由彼此之间的调适而进行跨文化的连接。也就是说, 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既相互区别, 又在跨文化情境中相互联系。由于开始客观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 接受不同文化的元素, 云林开始主动参与跨文化实践。她与中村有朋一起到麦格纳斯家庆祝农历新年, 这与华人社会传统习俗有所区别, 而是经过文化调适的、具有跨文化特征的“新”习俗。其中, 红春联、红纸灯笼和以书法写着黑色“福”字的正方形红纸等, 象征着喜庆、吉祥和美好祝福的华人文化符号; 插在瓷瓶里的樱花彰显着日本文化的印记, 是她从中村有朋那里学到的“物哀”美学的极致追求; 康斯坦夏酒庄的葡萄酒来自麦格纳斯的家乡南非, 道出所有流亡者散居在外的寂寥与豪情; 混合了华人、马来和印度菜的年夜饭更是呈现出具有跨文化特色的饮食方式:

浸着浓重酱汁发出光泽的烤猪肉、仁当牛肉、咖喱鱼头、椰奶咖喱酱嫩邦客岛捉来的螃蟹，家里菜园现采柠檬草压碎调制的咖喱鸡。（陈团英著、庄安琪译，2015，页205）

再次，通过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融合，可以突破个体的封闭性，维持个体的差异性，最终达到“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跨文化交流。夕雾花园是云林参与跨文化实践的产物。这座日式花园坐落于金马伦高原，里面有来自古老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石阶、中国的佛头像、日本天皇御赐的水车和原生于世界各地的草本、木本植物。另外，被命名为“天堂亭”的凉亭，是云林得到中村有朋的首肯，用姐姐云红最喜欢的英国诗人雪莱的诗歌《云》³为引，借由诗作所描写的云“产生——消亡——重生”的自然变换过程，表达了“唯有变幻才是物质世界的常态”的观念；中村有朋住所里悬挂的《老子出关图》是他父亲的画作，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故事，画中的留白部分既暗含了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不知所终的人生结局，也隐喻了中村有朋谜一样的一生。与老子选择离开之前给世人留下经世之作《道德经》一样，中村有朋在离开之前，给云林留下了体现他造园思想的夕雾花园，并通过日式纹身的艺术，将它复刻在她的背部。这个珍贵的纹身杂糅着不同的文化符号，显示出一种更为包容的跨文化特征。其中，茶花代表马久巴茶园，这是云林和中村有朋共同的朋友麦格纳斯建造的南非风格的建筑物，是他们跨越不同族群的界限，收获友谊的象征；莲花意指具有佛教禅宗意义的夕雾花园，薄云塘里的莲花一直守护着从天际飞来的苍鹭，带给夕雾花园流动的生命和寂静的时光，具有东方文化的宁静、超脱和愉悦之情；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是中村有朋作为日本人对皇室敬仰心态的表征，也间接表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实施侵略扩张时宣扬的忠君爱国思想；穿着日式传统服装的后裔形象则是对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的创造性改变；拘留营是云林和姐姐遭受日军折磨的痛苦之地；云之寺是云林和中村有朋超度富永昇灵魂的地方，因为富永昇的帮助，云林才成为唯一一个逃脱被日军活埋命运的囚犯；长方形留白是日式纹身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显示缺憾的美学意义。这些不同的文化特色，经过流动而彼此交互与杂糅，和谐共生于云林的身体上，呈现不同文化元素兼而有之的融合。

五、结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高涨，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曾经的被殖民者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后殖

³注：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诗作《云》写于1820年。其中，所有生命形式和物质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们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化之中。

民时代,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人口及信息的流动日益频繁, 民族、阶级、性别和文化的边界不断被消弭, 进而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跨国、跨文化经历的作家, 如日本的石黑一雄、印度的奈保尔、新加坡的林玉玲和马来西亚的欧大旭等。他们通过自身的经历及文学作品表达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陈团英也不例外。地理空间的不断流动以及文化空间的不断转化, 使他更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精神。

本文从文化理论的视角对《夕雾花园》进行研究, 发现小说中呈现的不仅仅是记忆与遗忘的历史, 更是深入思考跨文化实践的议题。云林的多元主体身份以及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能动性改造, 具备跨文化的特征。一方面, 被社会和家庭边缘化的云林, 通过与外来的日本文化的接触与了解, 进入文化涵化的阶段。另一方面, 随着日本文化的涵化, 云林思考自身原有的华人文化及价值, 进而通过跨文化实践来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陈团英通过塑造云林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协商与调适, 表达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华人进行跨文化实践的必要性, 也呼应了全球化时代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积极探索。当今世界, 文化交流逐步深入, 文化的迁徙与杂糅逐渐成为一种自然生成状态。因此, 只有打破封闭的特定文化观念, 跨越不同文化的边界, 以跨文化的思想来看待特定文化个体内部求新、求变的差异性以及各文化之间相互沟通、不断融合的趋同性, 才能真正消除隔阂, 推动文化交流, 促进人类的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团英 (2015)。《夕雾花园》(庄安琪译)。(原著出版年: 2012)
- 童恩正 (2004)。《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
- Bernard, W. (2018). "Trapped Between Worlds": The Function of Memory, History and Body in the Fiction of Tan Twan Eng. *Asiatic*, 12(2).
- Pellano, S. N. (2015). The Genealogy of Yun Ling's Ressentiment in Tan Twan 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3L: Language, Linguistics, Literature*, 21(3).
- Poon, A. (2016). Transcultural Aesthetics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in Tan Twan 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3(2).
- Rama, A. (2012). *Writing across Cultures: Narrative Transcult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 Frye, Tra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
- Shih, N. A. (2017). *Reconciling with the Past: Identity, Trauma and Testimony in Tan Twan Eng's Novel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ttps://ethesys.lis.nsysu.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etd-0723116-114236
- Tan, T. E. (2012).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Broadview Press.
- Williams, R. (2001). *The Long Revolution*. Weinstein.
- Yu, M. C. (2017). *Empowering Ruin: The Politics of Ruin (nation) in Tan Twan 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ttps://etd.lis.nsysu.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etd-0728117-170530